

編者按

要理解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和知識份子問題，就不可能繞過「五四」。撇開政客對「五四」的黨派宣傳不論，每一代學人在經歷了歷史大事件之後（不幸，現代中國差不多每十年就發生一次影響深遠的大事件），總是把反思「五四」當作話題，為自己在社會生活和學術方向上重新定位，90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也不例外。本期「百年中國」三篇文章，就是從不同角度審視五四和對反思五四的再思考。

高力克的研究表明，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份子雖然高舉科學民主兩面旗幟，卻忽視現代經濟倫理的建設；在普遍的反資本主義思潮背後，起作用的是傳統文化中的義利之辯。羅崗從評論本刊去年四月號孫尚揚、曠新年兩篇重估《學衡》的文章出發，強調認真重讀歷史文本、細心體察作者編者思想的必要，以超越新／舊、傳統／現代、啟蒙／學術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。象弘的文章則梳理了當前大陸文化理論界反科學主義的四種理據，並通過分析指出它們各自未能克服的悖論。

令我們特別高興的是，象弘和羅崗都是正在攻讀博士、碩士學位的青年學人，刊出他們的文章體現了本刊宗旨之一——積極推出學術新人。